

从中国翻译史论的发展 探寻中国史论结合研究模式

张白桦 聂 炜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 一直以来史论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过去、当前所处的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总和的综合研究,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的全面把握,进而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提出更为科学的理论观点,指导并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翻译史与翻译理论是同属翻译研究分之下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关于翻译史论关系的探讨为译学界所热议。文章结合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通过对翻译史的梳理,厘清翻译观的嬗变,进而对当下翻译现状有一个历时的了解与共时的把握,以期对现阶段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 史论结合;翻译史;翻译理论;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8)06-0079-08

自1987年“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以来,译学界就翻译学和翻译理论的一些基础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翻译史研究译著颇丰。随着数十部翻译史著作的问世以来,译学界已经对历史上的翻译事件、翻译主体、翻译思想等有了清楚的认识,但关于翻译理论,特别是中国现当代翻译理论的推陈出新,则尚乏善可陈。杨晓荣就剑指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的弊病:一只认国外,二只看已作古的权威,且不善于理论提炼^[1],由此可见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亟待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习近平在2016年就曾指出“建设理论中的中国”,需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

对于中国翻译理论“创新”的时代号召,蓝红军就拓展中国翻译理论提出了三种研究范式:论从“实”出、论从“论”出以及论从“史”出^[3]。三者均强

调了理论研究需要回归翻译研究本身,跨学科理论的引入只能是为翻译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翻译本身的问题。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创新,还得依靠中国译学研究者从中国传统译论、中国翻译史中不断探寻新的认识,探寻出翻译的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

一、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

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之处在于,其所研究的问题是大多是亘古恒今的思考,而自然科学是前沿性研究,主要围绕未经探索过的研究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对于学科的史学,除了专攻科学史的研究者外,并非一定需要了解或通晓^[4]。从古至今,哲学在不同时代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式上有所迥异,但在面对和探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基本是相同的,正是在这种跨越古今,横贯时空的追问中,反映出不同时代间的内在联系及各自特征,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绵延曲折的进程,同时也赋予了哲学命题更为具体的内涵和广

〔收稿时间〕 2018-05-23

〔基金项目〕 “内蒙古文化研究工程子项目”(编号为 MNZWHF2016-1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白桦(1963-),女,辽宁沈阳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聂炜(1993-),男,湖北宜昌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意。因此,史学在哲学研究中占有不少的比重,学者也试图平衡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从而提出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三种研究取向^[5]。

在哲学角度看来,史论关系中的“史”主要指的是历史或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6]。但史料不等同于历史,一定程度上来说,史料只是充当了记载历史材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史”可以界定为历史发展实际或者说是探寻历史发展实际的历史研究^[6],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历史这种认识活动上。史论关系中的“论”,主要含义是指“理论”。现代汉语词典“理论”词条指的就是由实践概括出的,关于客观事物科学知识的系统结论。在一定层面上,也指代由“辩论是非”“争辩”“评理”等组成的认识活动^[7],尤其是相关的理论研究等的一系列活动。

众所周知,狭义的“史”是指已经过去了的事实,或者说是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将其称之为“过去的历史”^{[8](583-584)}。他用“活生生的时事”(旧译本直译“当前的历史”)^{[9](601-602)}来指代客观事物当下正在发生、未来将要发生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他所定义的“史”也包含了正在发展、变化的现实。而“论”作为客观事物系统化的认识,同样也应以发展变化的视角来审视。

通晓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必要的,这为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10](383)},这就需要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为指导,以探讨史论关系为方法,建立起普适性法则,以适用于指导、预测学科研究的发展。而作为社会科学范畴中的翻译研究,同样需要哲学研究范式为指导,进行相关的探讨。

以哲学角度的史论关系分析,翻译史可以看作是翻译这一客观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过去了的事实。从恩格斯定义的“史”看来,翻译史还应包括翻译活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翻译活动发展。在形态上,翻译史是指翻译实践发展史,包括了人们认识翻译的历史。换言之。就是古今中外的翻译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关于翻译的一系列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翻译史料不等同于翻译历史,一定程度上来说,翻译的史料只是充当了记载翻译历史材料,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翻译历史这种认识活动上。但要真正全面把握翻译史发展实际,就需要对翻译史这一范畴以客观、全面、发展变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对一段翻译阶段的总结、评价,进而提炼上升至一个阶段的翻译思想、

理论。

翻译研究中史论关系中的“论”,与哲学史论关系中的论一样,其主要含义也是指“理论”。简单概括翻译理论指的就是由翻译实践而来的,关于翻译科学知识的系统结论,包含了翻译理论发展的一系列认识活动。翻译研究中的史论关系,近年来为译学界所热议,翻译史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材料的钩沉,记载表达现象或事实的层次,只能算得上基础性研究。理论的重要性在翻译史研究上体现为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全面分析各种历史事实。

二、中国翻译史的发展脉络

对于中国翻译史的划分,国内学者也是观点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马祖毅认为中国翻译史上存在四大翻译高潮: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两次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翻译^{[11](2-3)}。其次是谢天振从中西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的角度则将其划分为佛经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学界虽对翻译史的划分持不同意见,但对划分的依据与意义各有表述,且不具高下之分。笔者认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译事活动中,由于翻译对象、翻译任务与目的的改变,大致经历了宗教翻译、伴随宗教而来的科技翻译、西学翻译、实用文献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阶段,在各个时期翻译活动承担着传播文化、丰盈民族语言、完善社会伦理道德、影响国家命运的重要作用。

(一)“原文至上”“绝对忠实”的宗教翻译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资料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存口授《浮屠经》。”而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换言之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佛经翻译活动,在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记载,自后汉永平十年到宋代译事仅维持到郑和初年,参与佛经翻译的译者194人,译经卷1335部、5396卷^{[12](52)}。

佛教初入中国,与儒学格格不入,为了迎合我国当时的儒道文化,相关汉译本中多采用“佛道”一词描述佛教。东晋南北朝初期,佛经的翻译由个人转为集体,私译转为官译,并出现了译场组织^{[13](34)}。到了魏晋时期,佛理学与中国固有的玄理学、名理学相互补充。佛经翻译在隋至唐朝中叶达到了全盛时期,故

有“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晚唐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没落,我国宋元以后再无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

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据不完全统计,在词汇上,增加了35000个数量单位^{[14](52)};从音韵上来看,佛经翻译促使了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上来看,倒装句增多,提携句增多等。佛教文学文才异域,想象奇异,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意境。新的材料,又开辟了唐以降格律诗词新体裁,催生了六朝怪志小说,激发了浪漫主义文学,使古代文学获得一种解放^{[14](4-15)}。

(二)“达意传技”的科技文献翻译

“实用”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自古以来都是邻邦、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科技翻译成就了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15](93)},科技文献翻译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语言、文化间传播,刺激并引领了译入语文化的科技发展^{[15](101)}。

早在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伊始,便推动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公元14世纪之前,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15](109)},造成了对科技的输入远远少于对外输出的现象。我国的科技翻译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开始的佛经翻译时期,佛经中附有的古印度天文、历算以及医药学等知识随着宗教文献的翻译一并传入了中国。但不同于佛经翻译的“译场”(由官方统一选拔翻译人才,集体翻译),这些科技文献往往由译僧独立完成,内容零散,不成系统,但也为古代中国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如安世高所译的《舍头谏经》为我国可考证的最早天文学译本^{[16](21)},《婆罗门算法》为我国最早数学著作的翻译之一。

隋唐时期我国对外交流盛况空前,科技翻译达到了高潮。如从印度来华的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译,反映古印度数理天文学特征的《九执历》,就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数理学与天文学;梵僧不空所译的《宿曜经》,在后来许多的中国医典,如《外台秘要》《千金翼方》等中都可看到。隋唐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也逐渐传入我国。宋仁宗时代(公元1023—1063年),由学者马依泽编译,引入了阿拉伯天文知识的《应天历》^{[17](298)},中国更点之法即此开始。到了元朝,随着我国疆土纵横欧亚大陆,中国科学翻译的语种也由梵文转变为波斯文,科技翻译也逐渐向各领域延伸,如中国在数学上

所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正是始于元代。

(三)“存亡救国”的西学翻译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学也得到了长足且迅速地发展。16—17世纪上半叶,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入华传教,西学开始传入我国。如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传教士艾儒略所撰写的《西学凡》,介绍了当时欧洲大学文、理、医学、法学、教、道科等知识;邓玉涵口传、王征笔述的中国第一步力学书《远西奇器图说》;熊三拔翻译的《表度说》等^{[13](114)}。

虽然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技知识被传教士传入中国,但由于中国对传教的严格限制^{[13](117)},能够了解到这些知识的人并不多。一直到19世纪,清末民初时期,西学知识才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对知识分子产生影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注意到了西方的优越之处后,开始把西方文化译入中国,如林则徐亲自润色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林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他们虽然不都精通外语,但作为清末科技翻译的先驱,组织翻译了大量国外文献,对我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然而真正大量西学书籍的翻译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西方知识开始翻译入中国,甚至将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转译。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也积极推动并创设了兼学外语和科技知识的近代学堂,建立了一些翻译出版机构。为了储备自己的翻译人才,清政府也创设了京师同文馆、科学馆。李鸿章上书创办了上海同文馆,广州也创办了效仿上海的同文馆。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也翻译了一大批西方高质量的科学著作,这对后来的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单就翻译出版科技书籍数量而言,清末73年间总共译出2100种,而民国时期达到10700种^{[16](42-49)}。

(四)“育国育民”的实用文献翻译

19世纪之前的中国,科技和文化一直雄踞世界的首要位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强大文化自信,导致在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西方的科技仅仅被当作是“夷学”,翻译动机也不过是“师夷之长”。而且对于文学与文化方面,大多学士也持有“唯有中国有文学”的文化优越感^{[13](153)},唯有印度佛经中的民间故事和寓言可被勉强算做是文学翻译。

然而随着北洋水师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社会体系和思

想体系,通过翻译让社会认识到西学引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严复,其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在其基础上进行编译、加评论而来的《天演论》对当时社会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严复又陆续翻译了西方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原富》、社会学著作如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逻辑学著作《名学浅说》等,改变了当时社会对西方思想文化引进的态度。文学翻译方面,晚清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唯有中国有文学”的盲目文化优越感的危害。康有为曾以“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为当今大弊”^{[17](5)}来批判中国引以为豪的诗文无助于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梁启超则批判为:“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17](5)}。

此时翻译领域外的本国文学,尤以小说为代表,开始成为学者们改变社会的希望所寄^{[13](154)}。严复就曾指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7](12)},林纾也曾以“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16](26)}来解释自己的翻译动机。

以林纾为代表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启了民初小说翻译的高潮。据统计,1869—1911年间,中国翻译的小说达1124种^{[13](155)}。从题材上来看,主要有爱情、侦探、科幻三类,对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林纾的《迦茵小传》中将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如实的翻译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带来了极大冲击。《迦茵小传》一经出版,一年时间就被再版三次,敢爱敢恨、平等自由追求男女爱情、不受世俗约束的新女性形象,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饱受封建礼教的青年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共鸣。

这种以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为代表的爱情题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加之后来以程小青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和鲁迅翻译的《地底旅行》、卢籍东翻译的《海底旅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引入西方的法治观和人权观,破除迷信,增强科学意识有所帮助。

(五)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事活动

1. “东”文学翻译

二战后由于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

营的对峙,前苏联及当时的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以苏俄文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为主^{[13](208)}。据统计,1949—1958年短短9年时间里,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共计3526种,占总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65.8%,总印数达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的74.4%^[18]。

这一时期我国对于“东”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反映民族独立、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方面,以苏联文学为主体,俄罗斯文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为辅。这些以传递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为主题的俄罗斯文学,使中国人逐渐意识到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谢的《好兵帅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为代表的东欧文学,则激起了中国社会更为强烈的民族独立和自由意识^[19]。苏俄、东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文学范畴,波及到日常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与判断上,学界将其归为一种“情节”也不为过。

2. “西”文学翻译

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洋文学日渐稀少,苏联文学及批评大盛^[20],甚至一度出现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译介基本停止的局面,仅有少量作品如《麦田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文学作品的译介。

新时期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再次引入则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的推介^{[13](251)}。卞之琳等人相继在《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重新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后,在中国读者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以发行量达17万册的萨特《肮脏的手》为代表,大量黑色幽默、荒诞派、意识流的作品经由《外国文艺》杂志引入中国。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思潮相继与中国读者见面,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文学创作思路。

3. 翻译技术的兴起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需求,近年来随着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设立以及大数据、翻译技术的普及,赋予翻译市场化与人工智能的时代化特征,与市场经济、科技技术的结合,为翻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发展的快车道进程。

应用于翻译中以不同类型如人工翻译(human

translation)、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计算机辅助(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为技术手段,包含诸如计算机信息处理工具(comput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ols)、语料库分析工具(corpus-analysis tools)以及术语管理系统(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s)等专业翻译工具的技术,称之为翻译技术(translation technology)^{[21][5]}。随着1959年学者成功利用自主研发的翻译系统将20个俄语句子转换为汉语以来,翻译技术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学者总结翻译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1959—1979年间的萌芽期、1980—1999年间的发展期、以及2000年至今的繁荣期^[22]。肇始于翻译实践,依托于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于市场需求的需要,翻译技术研究在未来仍大有可为,研究价值巨大,可研究的前景广阔。这一方面丰富了翻译的研究视角,翻译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影响着国家对翻译类人才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翻译科技的繁荣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也不容小嘘,其推动了翻译技术向更高的层次递进。

三、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发展脉络

在漫长的中西翻译发展史中,翻译活动并不完全随着社会时代的更替而发生变化,它受限于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是跨越时代的。它是一种存在于不同语言民族间的交际需求,是宗教文化传播的载体,它的产生带来了民族语言的丰富、文化的交融与补充。中国的翻译活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对于翻译思想德探讨则严重滞后于翻译活动,直到两汉时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才出现一些如“文”与“质”的翻译观的探讨。

中国翻译史与翻译理论虽自成体系地发展,但两者相互依存、共襄发展。具体体现在一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影响了同时期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而“理论”最初的雏形就是由“辩论是非”“争辩”“评理”等组成的认识活动,而这些认识活动往往就是围绕着翻译活动的主体展开。

(一)“文”“质”之争

中国的翻译思想最早可追溯至佛经译者支谦。例如他认为前人的佛经翻译“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是“不雅”^{[23][15]},但维祇难强调译经不必讲究“饰”和“严”,只要做到“易晓”和“勿失

厥义”,因而支谦在译经时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2][22]},这是早期佛经翻译典型的“质”派译论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随后道安在佛经翻译实践中,总结了五种会导致失去原文本来面目的情况和译者会碰到的三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五失本、三不易”,不仅指出了佛经翻译中译者所面对的困难,还剑指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深深影响了后世的翻译活动。梁启超曾说:“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23][109]}同时期的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认为如果舍弃原文中的华丽词藻,就如同“嚼饭与人”^{[23][24]},是典型的“文”派观点。译僧慧远(公元334—416年)则取道安的“质”与鸠摩罗什的“文”,提出“厥中”的翻译思想,他认为佛经中有“文”胜的情况,亦有“质”优的情况,不能死守某个方法,而应根据所译对象采取折中的办法^{[23][27]}。到了南北朝及唐朝,以彦琮探讨翻译主体译者所具备条件和要求的“八备”说^{[23][33]}、玄奘总结五种情况下采用音译的“五不翻”^{[23][38]}原则为代表,开启了中国翻译思想新视角。

(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之辩

随着佛经翻译逐渐退出中国翻译史的历史舞台,中国翻译思想受到了社科经典、文学名著翻译实践的影响,译学界逐渐对围绕这一时期的翻译文本展开了关于翻译方法的探讨。鲁迅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翻译》一文中表达了“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的观点,提倡直译,甚至“宁信而不顺”。瞿秋白则反对不顾语言规律的“硬搬”,反对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主张“概念相等”。郭沫若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一文中则认为“除了原文的字句意义不能走转外,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能走转,在不损意义的范围以内,以气韵起见可以自由转移”,也是提倡意译。^{[24][335-242]}就翻译方法之辩,表达过类似直译观点的还有矛盾的“单字翻译正确、句调精神相仿”、焦菊隐的“论直译”等等。^{[24][408-414]}但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直译与意译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在对原文的忠诚度上区分出的两个相对的概念。围绕这些概念而展开的方法之辩,大大促进了中国译观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三)翻译标准的探讨

对于翻译标准探讨的余热至今还能在译学研究中捕掠到身影,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之辩,对中国译观的构建与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对翻译标准的探

讨,也是言人人殊,各抒己见。马建忠提倡“善译”^{[23](99)},强调文字应该与原文无异,能使阅读者所得益。这种强调译本接受效果的翻译思想与尤金·奈达的“等效”极为相似。而严复的“信、达、雅”,直到今天仍对中国翻译界有“余震”效应,这一观点把我国较为零散的翻译思想加以总结与概括,使我国的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25](85)}

严复之后,中国译论开启了以傅雷的“神似”^{[23](388)}和钱钟书的“化境”^{[23](419)}为代表的近现代翻译思想。傅雷在其重译的《高老头》的序中写到:“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6](3)},正视了中西语言文字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认为译者应该从更深层去“穿戴”原文的风格和意境等。继傅雷后,钱钟书在其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在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入另一国时,不能因用语习惯差异而使译本显得生硬牵强,应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2](696)}谢天振认为,钱钟书的“化境”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境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传承,它既强调文学翻译不能生硬,又要求译文风格不能丢失毫分^{[13](283)}。钱钟书的“化境”为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个最高境界,它让译本读起来像是原作的“投胎转世”,改变的是文字,而原作的精神依旧,读不出一一种被翻译过的痕迹。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以翻译标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认识方法论,更是将翻译视角延伸至更为宽广的角度。

中国翻译思想源自两汉,传统译论大致可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3](12)}八字简言。前两者建立在佛经翻译时期的基础之上,追求忠实,并且原文至上。而后两者则是建立在文学翻译基础之上,向更深层的忠实发展,力求达到与原作接受效果一致。这两者共同为中国译观话语体系的构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 翻译学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最早将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与艺术的翻译学思想,是董秋斯(1899-1969)先生于1948年发表的《翻译者的修养》一文。其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对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由于政治因素等各种原因,这一翻译思想直到33年后,才开始在中国译学界得到延续。如董宗杰的《发展翻译学,建立专业队伍》(1984)、桂乾元的《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1986)、谭载喜的《必须建立翻译学》(1987)、

杨自俭的《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1989)、许钧的《关于加强翻译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1999)、张南峰的《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2000)、谢天振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2004)、穆雷《探索、建设中国翻译学学科理论》(2004)等国内众多译学界泰斗相继对翻译学科的建设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为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各自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当下中国翻译研究中的史论结合模式探寻

中国翻译研究发展至今,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却未能像西方译论一样异彩纷呈,尤其到近代、现代、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严重敬慕于国外译论的丰硕成果,进而忽视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延续、阐发以及推新,造成了当下中国翻译理论提出的缺失甚至是空白。欣喜的是,这一现象正在得到译学界的正视与重视,也正在得以改善。其中中国悠久、厚重的翻译史不仅可以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一) 中国翻译史论结合的含义

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史论结合中的“史”主要指的是中国翻译史,可以界定为中国翻译史发展实际,或者说是探寻中国翻译史发展实际的历史研究,其重点在于研究中国翻译史这种认识活动上。史论结合中的“论”代指的就是“理论”,是在中国翻译实践中概括出的,关于中国翻译科学知识的系统结论,包含相关的理论研究等的认识活动。翻译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基本含义就是翻译历史发展与翻译理论相关的研究活动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国翻译史过去、当下以及未来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和相关事实的总和的全面研究,总结出关于中国翻译学科理论及相关的科学观点,进而促进翻译学科、翻译实践的发展。

(二) 中国翻译史论结合模式的探寻

要探寻中国翻译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就需要对两者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正确的梳理与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中国的翻译过去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过程以及翻译活动相关事实总和的全面研究。只有将两者

结合,探索史论的关系,才能准确认识翻译发展的历史实际,理论和相关思想才能得到共时的发展与历时的丰盈,进而推进二者的发展,真正发挥出史料对当下的借鉴与参考作用,理论对于事物发展的指导作用。

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以理论规范翻译研究,使得研究者在发现、分析、解决问题时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方向,在面对繁冗复杂的史料时,可以清晰分类,找到明确的研究对象。以科学的理论为支撑,也可以对问题有一个规定性的研究与描述性的呈现。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直接指导中国的翻译研究。由于中西翻译活动肇始的背景不同,发展脉络迥异,在套用西方翻译理论用以解释和预测中国翻译现象时,难免有偏颇、乏力的情况。这就需要学者以中国翻译理论来规范、指导中国的翻译研究,不断完善、丰富中国翻译理论的解释、指导、预测力。

翻译学研究问题有相当部分是亘古亘今的,只是翻译研究重点和方式上因时代属性的差异而略有不同,但他们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上是基本相同的。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翻译史料研究,准确且全面地把握翻译活动发展实际来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尤其解决当下中国译学界所面临的史料丰富却缺失自己理论话语权的尴尬局面。发展翻译理论的途径是多样的,如理论思辨、实践验证、学科描绘等,通过加强翻译史研究来促进翻译理论的创新或深化作用尤其不容忽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要有翻译史意识,翻译理论的出新要以翻译史为重要源泉,要立足于中国已经积累起来的翻译思想资源、丰富的翻译史料、翻译实践经验等作为翻译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中国丰富的翻译历史资源可以为理论的创新提供启迪,发现翻译发展的规律,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的创新。

特别是在研究某一翻译理论问题,解决实际翻译问题时,需要全面了解和透彻分析有关这一翻译问题的历史溯源,通过详尽的分析,客观全面的再现翻译历史发展实际,发现翻译历史中所暗含的翻译理论资源,进而充实、创新翻译理论。例如穆雷的翻译理论就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翻译经验,再而从经验中提炼出假说,进而将假说得到验证上升至理论的四个层次,这为译学界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构建的演化过程。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急需翻译界在翻译史料中挖掘、梳理出有关翻译的经验并加以提炼,形成翻译假说,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这些假说的解释、预

测与指导力,进而丰富、充实中国当代的翻译学科理论。

[参考文献]

- [1] 杨晓荣. 略谈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2): 39-42.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 (2016-5-20)[2018-04-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3] 蓝红军.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87-2017)[J]. 中国翻译, 2018, 39(1): 7-16, 127.
- [4] 聂锦芳. 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J]. 哲学动态, 2002, (9): 6-11.
- [5] 桑兵.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71(3): 67-76.
- [6] 廖其发. 论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0(2): 85-93, 182.
- [7] 杨和鸣编. 现代汉语词典[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11] 马祖毅等. 中国翻译通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 [12] 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4.
- [13] 谢天振等. 中西翻译简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14]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5] Delisle, J. & Woodsworth, J. (eds.)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16] 黎难秋编. 中国科学翻译史[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6.
- [17] 陈平原. 20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卞之琳, 叶水夫, 袁可嘉等. 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 1959, (5): 41-77.
- [19] 陈南先. 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4.
- [20] 廖七一. 翻译批评的历史语境(1949-1966)[J]. 外国语, 2017, 33(3): 97-103.
- [21] Bowker L.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2.
- [22] 刁洪. 国内翻译技术研究综述[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39(6): 69-81, 125.

- [2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24] 罗新璋.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责任编辑: 夏 雪)
- [25] 高惠群, 乌传袞. 翻译家严复传论 [M]. 上海: 上海外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ies to Quest Its Combination Research Paradigm

ZHANG Bai-hua, NIE We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Hohhot, 1008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ies alway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science domains.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ies, taking the scientific theories as instruction, can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researchers can posses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also helps researcher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endencies and rules to propose more scientific viewpoints which can instruct and foresee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ories are two kinds of research branches subjecte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Nowadays the issue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has been discussed widely. Combing with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y and theo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have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understanding towards current translation appearance by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which hopes to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ies; translation history; translation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